

# 最高指示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 学习文件

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决议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40

#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 报告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根据记录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现在我们开会!

我和姚文元同志最近一个时期离开了上海一段时间。回来以后, 革命委员会开过几次会, 讨论了最近的工作, 并且写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 昨天晚上革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也通过了。这几天, 在文字上作些修改, 就可以发表。

我今天想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在这里和大家谈一谈, 和大家讨论一下, 看看究竟是不是这样一些问题? 这样来认识是不是对? 我和姚文元同志做了一些分工, 我讲一部分问题, 他讲一部分问题。

市革委会的决议, 谈了四个问题。除了开头的一段背景形势以外, 提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深入开展大批判、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 第二讲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讲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问题; 第四讲了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思想建设和领导机关的进一步革命化。同时在昨天, 还把二月二十三号革命委员会所通过的那一个决议草案, 批准做正式的决议。因为当时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究竟是不是恰当没有把握, 虽然送给中央审查了, 中央也批了。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看来, 二月份这份决议还是适用的。所以就变成正式的决议。

这两个决议, 不管是二月二十三日决议也好, 这次通过的决议也好, 中心的问题都是政权问题, 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就是如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记得二月二十四号在这里讲话的时候, 传达过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 “我们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用这样一句话概括, 很能够准确地说明,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权问题上的一个特点, 它不同于十月革命, 也不同于一九四九年的夺权。这一次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我们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的,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我们就要把被篡夺了的这一部分政权夺过来。毛主席说: 这是只能叫做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而不能说彻底改善。就是说, 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 而是把无产阶级的群众, 放手地发动群众, 使得亿万人民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是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的条件下, 也就是说得到自上而下的支持, 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得到党中央的支持, 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最强大的专政工具是人民解放军, 而人民解放军是站在革命反派这一

边，在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之下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我们上海所发生的“一月革命”，和一直到今天的斗争，它的全部中心内容就是政权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两个决议的中心是这样，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想解决的问题，出发点也是这样。我们想解决的，就是要继续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已经夺到的权力。这是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我们每天忙得很，象林彪同志常常讲的，千头万绪，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忘了政权。就从这点出发，我想今天谈这么几点。

## 一、形势问题

第一点谈谈形势。全国形势好不好，这是一个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上海的同志也提出来问我们，因为我们刚刚回来嘛。在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们介绍过。今天在这里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全国的形势，不管革命的形势，或是生产的形势，都是大好的。

因为今天主要是讲革命，所以我把生产说一下。生产的形势全国不错，农业生产，据我们看到的材料，去年是丰收，今年夏收，看起来从南到北都是大丰收，比去年夏收普遍是增产的。个别地方有减产，全国来说是增产。今年的春耕一般进行得好，秋庄稼长得也不错。所以现在可以预计，今年的农业生产总的形势很好的。工业生产总的方面也还是好的。特别是人民解放军介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支工、支农方面做出的成绩特别显著。一月份生产的某些混乱状态，得到了改善。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都是比较好。四月下旬以后有些波动，现在有的地区也还有波动，但是总的形势看，还是不错。那些波动嘛，是一些暂时的现象。

生产是这样，革命的形势也是好的。经过今年的五个月，原来讲可以看出眉目，那末现在可以这样子说：这个眉目看得更清楚了。但是从另外一种现象看，有的同志总感觉到，最近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比较少。这是一种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那个地方的事情就没有进展。不过有一些地方的曲折可能大了一点。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的反复比较大，因为那个地方保守势力比较强。比如说，象西南地区嘛，许多同志从大字报上也看到了。那个地方出现了象贵州省这样的省，它很快夺了权，革命上了轨道。象四川呐，那是因为李井泉在那里工作了那样多年，邓小平也在那里好多年，遗毒很深。受蒙蔽的群众，数量不是很小。因此，在那个地方，现在的斗争就比较尖锐。革命派所付出的代价，那比上海的革命同志所付出的代价要多得多了。但是这样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只看到这一面，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面。就是经过这样的反复以后，也可能因为暴露得比较彻底，两方面的斗争更加尖锐。这样子，保守势力可能失败得更彻底，革命造反派受到的锻炼更好，那末将来，他们掌权以后，局面会更好一些。事情总是这样子的。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不能只看到一面。那里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它就不经过军管了。就用这种形式来筹备省的革命委员会。其他也有一些这样的地方。当然有的地方，因为大联合没有搞好，或者大联合遇到的阻力特别大，现在那里还相当动荡。这样的地方也有。我们同志们看形势的时候，特别讲到大好形势，有的同志总是很天真，因为讲大好嘛，就没有什么矛盾、冲突，没有什么曲折反复啰。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大好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总是有矛盾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但是要看看这种矛盾的性质，看向哪一方面转化，向着有利于革命派转化，还是向着不利于革命派转化。那么，我们看全国的形势，经过几个月，包括那一些反复比较大的地区，都是朝着对革命派有利的方面转化的。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主流**。我们觉得在目前，看形势的时候，特别要看主流。我们在一路上，包括在北京参加中央讨论一些省的问题，我们总算已经了解十几个省市的情况吧。每一个省市有的要讨论四次、五次，七次、八次。有的代表团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二个月，最后才做出结论。从

这一些反复的讨论中，我们就感觉到，现在要看主流。

有几个问题上，要注意主流支流，

第一，是十六条里讲了的，看革命造反派，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这一条，十六条从去年八月公布以后，反复的讲过了。我们最近向部队的同志的讲话，主要的是讲这一条。因为我们部队的同志，他们前一段没有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没有这样大规模地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对有些情况不大了解。看到革命造反派的问题的时候，容易发生这样的毛病，主流支流问题容易搞错。所以我们向部队讲，主要是讲对地方造反派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要看大方向。这是一个主流支流要注意。

第二，我们向地方的同志讲，对人民解放军的工作，我们对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这一方面的工作，也要看人民解放军的主流，也不要弄颠倒了。不要把人民解放军支援地方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毛病，当作了主流，而看不到真正的主流，把支流当作主流。那就要犯错误。有些地方的同志犯错误，就犯在这个地方，就是把人民解放军的主流看错了。我们向地方的同志讲，向红卫兵小将讲，党中央总是说，对小将的错误，应该当作支流，要看大方向、看主流，那么为什么对解放军这些红卫兵老将，就不应该这样看呢？我们说，对小将对老将都有一个看主流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红卫兵嘛，都是毛主席的部队嘛！这是第二个主流支流问题。

第三，我们最近又碰到一些各个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这个造反组织看那一个造反组织，我们觉得也要多看对方的主流，注意对方的主流，不要把支流当作主流。因为这一个时期整风，有的是诚心诚意地整风，有一些别的兄弟组织来了，给人家提意见，这完全是正常的、应该的。但是意见一提得多了嘛，慢慢就糊涂起来，就把支流当作主流了。我这里还不是讲保守派，我是讲两个造反派之间。有的明明是两个造反组织，互相之间贴大字报，散传单，到社会上到处去贴，到处去散，那么就把有一些造反派说得不象话了。这样也把支流当作主流，这也是错误的。

我们最近就碰到，在这三个具体问题上，都有一个主流支流问题。如果我们处理不好，把它弄颠倒了，我们就犯错误。最近好多地方出现的问题和这些有关。这是讲全国形势，和我们从这个中间所感觉到的看问题看主流支流的问题。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来看上海的形势。同志们中间有一些争论，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觉得上海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同样是好的，很好的。这个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可以从事实上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上海这一个时期大方向究竟正确不正确。我们认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各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掌握大方向方面，还是正确的。这个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上海在和旧上海市委里边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一方面，始终没有停下来，而且逐步地深入了。不但去年大方向是这样，“一月革命”以来，整个大方向，斗争的矛头，始终没有转移。我们每一个时期具体的斗争任务，不管搞促进大联合也好，搞“三结合”也好，都和这个大方向紧紧地联系起来。我们没有孤立地去搞干部亮相，没有孤立地搞大联合，而是把这些斗争和斗争陈、曹联系起来的。而且用斗争陈、曹来促进了大联合、“三结合”。我们这个作法，在北京，向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都汇报过。在中央的其他会议上，我们也介绍过。中央和外地的同志，认为我们这个作法是好的。有的地方现在也是在用这个办法来进行工作。

对批判刘、邓，我们感觉到，上海在这一点上，跟中央是跟得紧的。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一发表，上海就紧紧地跟上来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过统计，全国的报纸，跟得最紧最快的，还是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发的社论也最多，而且和当地的斗争联系得比较好。用

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这样一个口号，是上海先提出来的。这一个口号，也已经被全国所同意了。批判刘、邓，现在还在那里继续发展。我们很高兴，这一个批判，现在已经不只是举行了一些全市性的大会，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而且比较深入了。我们已经看到，或者直接听同志们谈到，也找人谈过，也访问过个别的地方，现在在工厂里面，车间、小组也进行批判；农村里边，生产大队、生产队，在田头也进行批判。有的街道居民委员会，也召开了批判会。而且不是空空洞洞的，是和它那里的斗争、和人们的思想联系着的。这都是很好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在对敌斗争方面，这个大方向我们没有转移。

那末，另外一方面呢？在上海，没有大规模地取缔群众组织，没有大规模地解散群众组织。全市抓的人也很少。而且，由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和公安机关自己下决心抓的，数量很小。多数是群众扭送来的。扭送来以后，你不收？那不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是你说群众扭送都扭得那么准啊？当然也不一定。如果都要那么准确，群众就没办法行动了。所以这个事情也不能怪群众。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抓错的？有，总会有抓错的。但是也应该从另外一方面的看。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谈，比较起来上海抓人少，这可能是个优点，但是也可能包含了另外一方面的错误，就是说，我们该抓的没有抓。事情总是那样子。上海就没有反革命？那才见鬼了！如果那样看，我们就是傻瓜。有些该抓的，我们没有抓。现在正在甄别，加以审查。该放的，现在大多数放了。还有一部分没有弄清楚，还没有放。这个事情进展得据我看是慢了一点。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放的人大部分是放对了，个别的也有放错了的。所以我劝那些在公安局门口等着的人，你们要当心一点啊！你们要的人，究竟是要对了还是要错了？你们要动动脑筋的啊！（热烈鼓掌）不要以为都抓错了，也不要以为都放对了。

这是讲大方向。这是从对敌斗争和对群众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觉得上海工作的大方向，这几个月，也包括我们不在家的几个月，大方向还是正确的。这是第一。

第二，上海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是有进展的。虽然进展得不是那么快，可是一直到这几天吧，还在进展。市六女中，自己实现了大联合，现在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体育战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都是说明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还是在发展，不是倒退。已经成立了的革命委员会，县也好，区也好，市革命委员会也好，都没有垮台，还是巩固的。当然，大联合和三结合进展的中间也有问题。比如说，在大联合中间，有一些组织联合得不好，或者到现在根本就没有联合；也还有联合了又垮台了的，又拉队伍了，又分裂了。这样的现象有，我们也正在仔细地研究这个情况。在这里，有的同志提出来，说不能够强调解散组织。我们说，这个事情要作分析。下命令解散一个革命组织，这当然不行。一个革命组织，我们是不会叫它解散的。但是有几种情况，那算不算解散组织呢？譬如市六女中原来的好多红卫兵组织，现在变成红卫兵团了，原来的组织解散了，你说算不算？我说，这个算，但是这是一个进步，是一个革命，不能说是倒退吧？这样的“解散”，我认为应该得到支持，不能反对。相反的，你如果说不能解散组织，那就要把她们那个红卫兵团解散，重新拉起来，又变成了几十个组织。那有什么好处啊？现在有些同志，看问题就是不作分析。还有一些组织，我们的二月二十三日决议写了的，根据中央的规定，一些经济主义的组，行会主义的组，跨行跨业的组，应该解散。这一点，我们认为不能动摇。这是中央的决定，而且是经过革命委员会讨论过的，各个革命组织都一致同意的了（鼓掌）。现在有一些组织，又想拉起来，什么红色工人组织，又想拉起来。我们认为临时工、外包工这些革命的同志，他们应该是加入当地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没有必要单独成立组织，这是中央在决定上写得清清楚楚的，应该执行中央的规定。红卫军这个组织，也不能恢复，因为这是中央已经规定了的。进行这些活动，没有什么好处。还有的

又想搞出一些新的组织，搞了个什么“新工总司”。有了一个工总司了，你再搞一个新的干什么呢？你以为新的都好，旧的就不好啊？那才不见得嘞！中国共产党就比你这个“新工总司”老得多，但是她是个最革命的党！（鼓掌）我们在这里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支持原来中央所批准过的、支持过的工总司，反对这个什么“新工总司”！（热烈鼓掌）

这是关于大联合和“三结合”。我们看，上海的大联合和“三结合”还是在发展，虽然有人总是在那里破坏、捣乱。我下面还会讲。

第三，上海的形势好，还表现在抓革命促生产这方面。我们的生产是上升的，不管是工业也好，农业也好，交通运输也好，外贸等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中小学的复课闹革命，都是有发展的，有进步的。这一方面，我不想多讲了。

第四，我讲的形势好，还表现在我们的革命秩序，新的革命秩序，基本上好的。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各个方面向我们反映，我们也查了一下，想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想搞一些事情，对市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这样的事情还是不少。到处煽动分裂，这种事例，还是存在的。挑动武斗，虽然规模不大，件数不多，但是在有一个时候有一些发展。最近这几天，也有一些发展。还有一些到处打、砸、抢，破坏革命的秩序。有些地方，流氓阿飞有些活跃，而且提前了。往年是七八月份才出来活动，今年提前两个月出来了。（笑声）搞投机倒把的人，最近有一些活动，贩卖票证，搞投机倒把，扰乱我们的革命秩序。这一些，统统是代表资本主义势力，向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的挑战！当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就是那么一小撮人。你们所有的流氓阿飞都加起来也没多少，就是那么多！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革命反派的同志，革命的人民要警惕。如果我们不采取正确的措施，不在群众里面提高警惕性，让它们发展起来，就有可能造成对我们的威胁。“上体司”的同志，他们对这一点很关心，狠狠打击流氓阿飞，我们支持他们这个行动！（鼓掌、口号声）当然啰，打击面不要太宽，要注意。因为有时候，流氓阿飞的界限很难划分。不要打击面太宽，不要把一般的小孩子都随便地捉起来。而且这件事情，流氓阿飞的问题，要和我们批判刘邓路线、和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联系起来，就是找它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要从根本上铲除它，不能单单靠抓人。这一点，也请大家充分地注意。

上面就讲了这四个方面：大方向的问题，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的发展，抓革命、促生产和我们的整个的革命新秩序。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我们感觉到，上海的形势是大好的。我们觉得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不是每一次讲话都照常说一下。我们觉得，这证明，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市政治生活里边，是占着优势的，是有战斗力的，是能够把夺到的权力，把夺到的政权、政权、财权、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是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鼓掌）这也证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上海是深入人心的！（鼓掌、口号）这也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旦掌握了群众，一旦被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被全市的革命人民所掌握，我们上海人民就是战无不胜的！是可以战胜一切资本主义逆流！（鼓掌）所以我们讲，我们要珍惜这个形势。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听到这里有一些同志有不同的议论，我们曾经打电话，要同志们注意，不要把上海这样一个大好的形势，因为我们自己的过错而破坏了。我们要珍惜。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关，是我们大家经过一年的奋斗，和旧市委作了一年的艰苦的斗争得来的，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支持之下得来的。我们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形势，是不容易的。这一点，并不是我们自夸。我们不是说，我们好不得了啦！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点也没有满足。我们每天象大家一样，对上海的形势，对工作里面碰到的问题，也并不是很安心的。因为阶级斗争比较复杂、比较尖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上海这个战场上，从来就是尖锐的，从来就是

激烈的。解放以前如此，解放以后如此，我们夺权以后，还是这样。那些下台的、被我们打下去的人，他们会甘心失败吗？他们不会的！他们随时准备上台。如果我们搞不好，他们就要上台了。毛主席最近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不要以为一次就行了，也不要以为两次、三次、四次就行了。他特别讲到，弄得不好，资本主义随时可以复辟。同志们！“弄得不好”这几个字啊，很值得我们想想！无非是敌人把我们弄得不好。但是，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弄得不好，人家就要上台了。不要以为刘邓不愿意上台，刘少奇的国家主席现在还没有撤嘛！怎么不愿意上台呐！你们以为曹获秋不愿意当市长啊？他对这个革命委员会就这么满意啊？那才不会哪！

所以要珍惜这个形势，这是得来不容易的，同志们！

现在有的人说什么，上海要第二次大乱，而且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同志们，你们说这个口号对不对啊？（台下群众：“不对！”）这个乱，是有阶级性的。在我们没有夺权以前，去年的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吧，那个时候，那个陈丕显、曹获秋他们呢？就是怕乱。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大乱特乱！乱谁呢？乱不到我们无产阶级。乱资产阶级，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乱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而在这个乱中间，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面目。最后，问题弄清楚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夺权。这是那个时候的乱。那个时候，确实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

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了权，还要大乱特乱，现在乱谁呀？就是乱在座的同志们罗！就是弄得你们日子都不好过，铁路也不通啦，码头也阻塞啦，也没水吃啦，也没有煤运来啦，生产下降，那就叫“大乱特乱”、“越乱越好”。那是乱了谁呢？现在再乱是乱了谁呢？是乱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是乱无产阶级的专政的政权。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大乱特乱了。形势不同，口号要变了。有些口号这个时候用是完全正确的，换个情况，就错了。对于这个方面用是正确的，矛头对另一方面就错了。老实说，我们一方面应看到政权来之不易，另一方面我们要想到上海的革命秩序要破坏掉，来个乱特乱，也不难。我们今天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决议，今天一夜上海就可以大乱特乱。但是我们不能够干这个事呀！因为我们可以做若干比较。我们如果不是紧紧地跟着毛主席路线，不是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说很早以前，就是一月革命夺权过程和夺权到现在，我们好几次都可以垮台，都可以乱掉。我们就看一看一月份的夺权。那个过程里面，我在这里讲过的，同志们也知道，我们也不止一次夺权呀。我们算一算，大概是五次夺权呀！每一次夺权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如果没有正确处理的话，都可以造成我们的大分裂，我们的权就根本夺不下来，夺下来也不巩固。一月十四号、一月十五号夺了一次。到二十二号又夺了一次。再往下，到了二十四号，又夺了一次。到二月三号又夺一次，就是那一次算是夺下来了，二十八个团体发起单位。但就是那时，同志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处理不当的话，是个什么局面呢？二十八个单位要成立人民公社，宣言也准备好了，委员也选好了，打电话给我们两个，说向你们报喜，我们成立了。这个时候，如果不是中央及时指示我们要搞“三结合”，如果我们那时不去说服另外一批同志，或者那一些同志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他们就要成立第二个公社，第三个公社，那上海不要四分五裂了吗？！什么大联合呀，大联合那个时候就破坏了。当然，因为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根据毛主席的路线，做了工作，而且，那时要想另外搞一个公社的同志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没有搞成大分裂。同时呢，把原来的“组成”单位改成“发起”单位，你们不要看这两个字的改变，两个字的改变，避免了分裂。又提出要允许别的单位逐步参加人民公社。当时是这样解决的。江苏为什么现在还不成立革命委员会呀？我们这次到江苏住了八九天，就是反复的给他们谈这个问题。这点是我们在北京慢慢明确起来的，感觉到上海如果搞不好，当时也完全可能分裂。他们是这样，一批也是几个大的造反组织夺权，没有联合另外

一批造反组织。这样一来，就从省一直分裂到农村，到基层单位，都是两派。那天我们两个人去看长江大桥，因为那个工程和我们上海有关系，就去看一下。到那个大桥上，到工程管理处，问一问接待人员：“你们是几派？”也是两派！问他究竟你们的分歧在那里呢？说来说去，说不上来。一月二十六日夺了权的，是夺权派。夺权派就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这叫“好”派。另外被排斥的一派呢？那就很生气啦，他们就说“好个屁”。于是那里有人开玩笑说，一个是“好”派，一个是“屁”派。那么，这两派的分歧就大得很啦。（笑）同志们，你看，听起来好象很可笑呀，但是，如果我们一月夺权过程中，不搞大联合，不坚持革命的大看，那我们就不采取正确的措施，我们上海也是两派，或者是三派。所以今天这个局面，不容易呀。同志们！如果一直到现在，上海还是两派、三派，同志们，那你看这将是是个什么局面？！那还能讲上海是大好形势吗？有必要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如果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就会有怎样的结果；我们如果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又会带来什么结果。一步也不能离开毛主席的路线。路线这个东西，你抓不住，摸不着，但是它真起作用啊！你离开了一步就要犯错误。我所以要讲一段这样的历史，就是要看到，这个形势，我们得来不易，但要破坏它，也不太难。只要我们革命的大联合破裂了，局势立即就会改变。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丧失警惕，阶级敌人总要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我们大联合的，千方百计地从各个方面，有时从这一方面，有时从那一方面，有时是公开的，有时在幕后，挑拨离间，分化我们，瓦解我们。我们要警惕，不要上当。因为我们自己掌权的时间很短，经验很少。我和姚文元同志就经常感觉到，担子实在是挑得吃力得很呀，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有的同志可能感到担子太轻，想加一点，那当然好。我们实在是感到挑得吃力得很。当然我们也没有权利推卸自己的责任。一个共产党员么，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给我们的担子，我们就挑。至于做好做坏，那依靠同志么。我们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本事。刚才讲的，上海好的局面，完全靠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做的。我们在这里不在这里，关系不大。这次我们出去一个半月，上海的工作不是很好吗？连毛主席都这样认为。那时我们有点想回来了，毛主席就说：你们不是离开了一个月了吗？！意思就是说，那里的工作不是一样做吗？！毛主席对上海的革命群众，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充分地信任的，是相信你们能够做好工作的！（热烈掌声）

但是，越是毛主席、党中央信任我们，信任大家，我们就应该看到我们自己有弱点。我们没有掌权的经验，要管理各种事情，我们的经验很少，大家的经验也很少。我们可能犯错误，可能犯大的错误。这样我们就应该谦虚谨慎，应该经常看到我们工作的困难。要时刻都想到革命的群众，相信群众，不要受外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冲击。我跟有些造反派的负责同志谈过。他们有时谈到形势似乎就困难得不得了啦，“反革命逆流呀，好厉害，压得都喘不过气来了！”我说，“那有那么厉害呀？”没有那么厉害么！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同志们，他光听一种话，听多了，就会弄得看问题的方向都乱了。我和姚文元经常警惕这一点。因为老实说，天天找我们两个人的，好事不多，给我们报喜的呀，一个月一件也碰不到，但是报忧的电话、电报，一天不知几十件。有两天，我们两人准备修改这个决议草案，就是坐不住，各派的电话电报，你说的这样，我说的那样，差得那么远。不看又不成，拿起来一看就把你的头脑弄乱了。如果光看这些材料，你就会觉得一片黑暗。实际上这还是局部的问题么！有时候一种浪潮来了，会使自己受冲击，自己不清醒了。将来敌人可能故意制造很多事件，迫使我们犯错误。所以要特别小心，特别清醒，谦虚谨慎，很好地学习，紧紧地跟着毛主席，快快地跟着毛主席。毛主席的方针，他说的话，中央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们深深感觉到，现在造反派的许多负责同志，看书看报太差劲了。上次我在这里讲过，以前受压迫时，一遇到困难，《语录》拿起来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呀，《红旗》杂志社论是一道又一道地看呀。现在《红旗》杂志来啦，还有那个看劲呀？不看了。现在还有

人专门等着上级布置，那怎么成呀？上级不给你布置，我们这个上级以后也不大布置事情！我们要发挥革命创造性，发挥革命的首创精神么，紧紧地跟么。我觉得前个阶段思想混乱，和有些同志不看书不看报关系很大。因为我们知道，“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这句话是见于《红旗》杂志的社论，但是同志们，你们就不注意，这一句话以后就不再出现了，没有了，你们去查好啦。但是有些同志就揪住这句话不放，还在那里揪呀，揪呀！中央立大会上讲话，讲拥军爱民呢？就是那时已发现有些人抓住这句话，好人坏人都有。我们的好同志对这句话没有理解，坏人又利用这句话，到处去找什么武汉的谭震林呀，上海的谭震林呀，广州的谭震林呀，这里的赵永夫，那里的赵永夫呀，到处去找。实际上把矛头对准了解放军。我们看到大量事实，所以才提出来拥军爱民这个口号，用这个口号代替了那个口号。我们接触很多同志，他们都没有发现这个变化，还揪那句话。中央口号变了，有些同志不注意。《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的变化，都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哟。我们不是说毛主席是伟大的舵手么，我们伟大的舵手，看到前面的危险，有暗礁，或险滩，已经把舵呀转了，已经在绕弯了，我们的同志也不看伟大的舵手已经在转舵，还向那个暗礁、险滩上撞呀。（笑声，掌声）我们不是要紧紧地跟着毛主席么？就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要清醒点，要快一点，要跟得快。有些同志不清醒，明明口号在变化，他还用那个口号。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使得我们的思想，适合于变化的形势，而我们有些同志在这方面是有缺点的，我今天就多说了几句。这是第一个问题，讲讲形势。

## 二、掌握大方向问题

刚才说过了，我们夺权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焦点就表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群众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的矛盾。这个矛盾，全国都是一样的，夺权以前是这样，夺权以后仍然是这样。我们上海全市的权夺了，但是，区、县和好多单位，革命“三结合”的机构还没有建立，我们的权还不能说完全夺下来了，还要继续夺权。在这个问题上，在这过程里面，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了主要矛盾，不要忘记了大方向。这个话说了了一年了，但是经常受到干扰就会忘记了。别的事情错了，不要紧，可以改过来，你的大方向正确，犯了错误比较容易改。这个大方向错了，你有了成绩也不能算帐了。我们现在就是要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来巩固已经夺了的权，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说要巩固，这不是保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不是保守。我们要巩固它，那就是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把千百万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继续向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进攻，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进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觉得有两方面事情要做。一个是继续对敌斗争，这是主要的。一定要把刘、邓这一条反动路线，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彻底地批倒批臭。这个事情，上海是有成绩的，我刚才讲了。但是要继续进行下去，还是很艰苦的。我们最近找一些同志谈，普遍的问题是“深入不下去了”，问我们怎么办？我们说这个事呀，还是问你怎么办吧，你回去跟群众商量该怎么办。主要的是，前一段我们是猛打猛冲，现在还是要猛打猛冲，但是碰到的这个对象啊，光是一般的猛打猛冲不行啦，要坐下来看点书啦。这个就难了。有些同志啊，现在就是坐不住，还找出了好多借口，说如果叫我们坐下来批判刘、邓，这是彭真的“二月提纲”的路线啊，这是闭门批判，是学术讨论。同志们，这个不是学术讨论，这是最大的政治斗争啊！这个革命的大批判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里边的焦点。如果这一条路线不批倒、批臭，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就随时存在。我们越是把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这一套彻底批

判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巩固。还有的同志说，你批它有什么用呀，刘少奇又听不见又看不见，还不如搞一搞我们那个车间主任好呢！有的人说，我要搞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把保守派拿来斗一斗。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他听不见，他可听得见呀！不但刘少奇听得见，我们在这几批判，莫斯科、华盛顿都听得见。因为它们是心连心的呀。打在刘少奇思想上，莫斯科、华盛顿都会痛的呀！因为我们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路线的一个进攻。千万不要小看了它。同时这对我们自己，对提高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有决定意义。因为刘少奇的这一套，它是系统的，完全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要大破大立，不大破刘少奇的这一套，就不能大立毛泽东思想。

这涉及到各个方面：我们的党究竟怎么建设？是按毛主席的路线建设？还是按刘少奇的一套建设？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党组织还在那里瘫痪着。我这一次在中央，正式向主席请示过党组织是不是恢复活动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党，很多党员，这些年来脱离群众太厉害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可以得到改造。在目前恢复活动，不好，因为群众还没有这个要求。恢复了，他们也不能够起战斗的、领导的作用。因此，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半年以后再说。**在这里，我就向上海所有的共产党员，正式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个意见（掌声）。在半年的过程里边，我们想，所有的共产党员同志，应该象我们以前说过的，不要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要坚决地高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方面，和革命反派的同志坚决地站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掌声，口号）我们的党员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也有一部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犯了错误。还有小部分是坏的、混进党里的坏人。我们希望，所有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能够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坚定地走在斗争的前边。如果前一段有错误，那就应该很快地和群众站在一起，检查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自己脱离了群众，就应该很快地和群众站在一起，跟上去，和群众打成一片。那么，我们的共产党员，经过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可以成为真正的、能够一直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高举革命的旗帜，能够坚定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能够保证我们的国家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战士。我们希望，我们全市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过好这一关。（掌声、口号）

我们和刘少奇的路线作斗争，还会涉及到如何改造我们的整个国家机关的问题。我们现在机关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但是，也应该承认，有一些同志在机关里耽久了，养成了一些坏习气。现在，我们就要从批判刘少奇这条路线着手，在大批判中检查我们的国家机关究竟该怎么办，我们的工作制度如何？作风如何？在成立了“三结合”机构的条件下，恐怕将来要搞一次大鸣大放，搞一次群众运动，好好地讨论一下机关工作，使得我们的机关真正的革命化。没有这一条，我们建立起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也仍然不能够联系群众，仍然有可能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革命的大批判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可以举这样的例子，如我们的工会，现在很明显了，完全按刘少奇的一套搞的。刘、邓长期办工会。以前有一个问题我老是弄不懂，就是为什么有些教授、演员，又有红派司，就是工会会员证，又说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也来问我究竟怎么回事。当然，那个时候就找了一些理由作了解释，但是一边解释，我也一边声明，这个解释也不见得妥当，因为总觉得这是个矛盾。现在弄懂了，这都是刘少奇的一套。他实际上是把工会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搞得大大的。同志们回想一下解放初期那个工会组织嘛，不但有产业工会，还有机关工会嘛，还有文艺界的工会嘛，实际上是个全民工会，不是工人阶级的工会，是个全民协会。所以才会出现那种现象，阶级阵线完全打乱了，到处搞疗养院啊，搞福利主义，搞经

济主义那一套。这个流毒也是很深的。如果我们工人造反派不把刘、邓的这一条搞工人运动、工会工作的路线彻底批判好，同志们啊，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就执行他那一套。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希望你们自己想一想。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一些这样的苗头，很值得注意。

至于其他的教育、文艺，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里面，都包括着刘少奇路线的影响。我们讲的刘少奇，就是讲他这个总代表，我们只有把他这一套彻底地批了，那么毛主席的路线才能够在我们头脑深深地扎根，我们才能够真的紧紧地跟着毛主席。这样一件事是艰苦得多，需要作调查研究，需要找人谈话、开会，开大会，开小会。恐怕要多开一些小会，要谈谈心，要作细致一些的工作。还是大、中、小会相结合，完全靠大会是不行的，完全靠小会也不行。这就需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这个斗争里面，建立新的功劳。造反派同志是有功的，但是如果背上包袱，以为自己的功劳了不得了，我是老红卫兵，我是老造反，一背这个包袱呀，就很难前进啰！其实老造反也不过一年嘛，同志们，没有多老啊，还是要建立新的功劳啊。我们要象毛主席希望我们那样，为人民、为革命造反，建立新的功劳，这样才算一个革命造反派的战士。（掌声）这个事情不能靠专家。还是要靠小将们，靠造反派的战士，搞群众运动。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先进单位，农民已经到了田头嘛，有些工厂在车间里边、小组里边都讨论开了嘛。只要我们相信群众，放手地发动群众，这个大批判是可以搞得起来的，可以搞好的。这是讲大批判。

大联合“三结合”再说一点，不想详细讲了。主要的，我想说一个观点，就是不管是革命的大联合也好，革命的“三结合”也好，都要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能要求一开头就那么十全十美。我们两个革命组织、我们两家一点分歧都没有了再联合，如果按这个标准，同志们，我说那一辈子的联合不起来。分歧、矛盾总是存在的。今天在这个问题上矛盾，明天又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有矛盾。矛盾是永远存在的，问题看是不是在大方向上一致。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地想一下。有些同志，我感到，要嘛根本不讲原则，什么人都联合。那当然不行，那是不讲原则的联合，我们是反对的。但是现在联合中间很重要的阻力是，有些同志要求太高，不是把它当作一个过程，逐步的完善，没有想到在联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变化，有缺点就克服，有错误就改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三结合”也是这样。你想一开头“三结合”的班子就那么好啊？那也不可能。只要是革命造反派能够掌权，能够成为核心，我们觉得，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搞“三结合”。如果那里，比如学校里面，院长、校长、副校长、副院长一时搞不清楚，那么你有中层干部“三结合”也可以嘛。一个厂也是这样，如果能够左派占优势作核心的条件之下搞起“三结合”的班子，然后逐步地完善，那就好办一些。如果要等到完全完善了，那样我们临时权力机构也一定完成历史任务了嘛！它的任务就是完善，把各个方面筹备好了，那就应该建立正式的权力机构了。

在大联合、“三结合”中间，我们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格地区分两类矛盾，要防止坏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利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利用我们某一些同志的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或者利用某一些极“左”的口号，来破坏大联合和“三结合”。现在来提口号破坏“三结合”、大联合，不会用右的口号，都是提得“左”得很，他比你还革命哟！人家就是利用我们革命造反派的缺点，利用了我们犯了错误，就狠整，破坏我们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破坏已经夺到的权利，有时候就挑起武斗。

头二天，我们刚到上海，就看到街上大字标语，“版司”被砸掉了，公安局“公革会”受冲击好久了。这几天，又把“体司”砸了一下。我们觉得这种武斗，一定有坏人在挑拨。革命造反派不需要武斗。现在谁要搞武斗，实际上只能起破坏革命新秩序的作用，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里边有一些人，也戴着革命造反派的袖章，实际上，照我看，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者是流氓无产阶级革命派，或者是封建行

会主义的革命派。我看不说他不是革命派，因为他也革命，但是他头脑里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习气，用那一套东西，来解决我们革命运动中间的问题，那是错误的。有的就是这样。明明两个都是革命组织，就那样干！你有什么本事，我可以拉多少队伍！那个队伍哪里是你的？那是毛主席的，你这么能拉？（热烈鼓掌）你有个什么队伍？你不过是一个人！我现在也可以跟你说，我也可以调队伍，但是我从来不能这样想，如果我这样想，如果我这样说，我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随便可以调队伍去打架，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是个革命造反派！（热烈鼓掌）可以把国家的汽车卡车几十辆几十辆这样调动，你有什么权利？那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动的哟！为什么自己可以这样动？何况体司、版司、公革会，这些都是革命组织嘛，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热烈鼓掌）

我还要讲到铁路。这几天，铁路系统不稳定，有人在那里想搞反夺权。在这里，我想应该明确的说：铁路联合指挥部，港口的指挥部，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在“一月革命”中间，在旧市委使上海的经济处于瘫痪的状况之下，这一批同志，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完全出于为国家、为社会主义祖国的集体利益，勇敢地挑起了革命、生产两副担子，发动了“一月革命”。他们的夺权，是谁也不能否定的！谁如果否定铁路和港口的夺权，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夺权，也包括其他工厂企业单位里面真正革命造反派的夺权，谁否定这个，谁就是否定“一月革命”！（热烈鼓掌）那个地方，原来的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活跃，我们要在这一个大会上公开地讲：你们如果想搞反夺权，你们想把铁路联合指挥部搞垮，我们革命委员会是决不允许的！（热烈鼓掌）如果在最近这个时期里边，铁路上发生了停车或者其他的事件，这个责任，我们现在就公开地宣布：要由原来的局长、党委书记负完全的责任！（热烈鼓掌）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无非是说，我们同志们要警惕，不要再互相打内战了，要看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不是说这里没有问题。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看得准一些，如果哪个地方想搞反夺权，想搞复辟，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依靠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依靠上海的人民解放军，我们完全有力量，他在哪里复辟，在哪里夺权，我们就在哪里把他打下去！（热烈鼓掌）

为了使得我们更有力量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更需要加强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要很好地爱护我们的革命的“三结合”，爱护我们的革命大联合。凡是有利于革命大联合的事情，我们就要多做，做好，凡是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事情，我们一件也不要做。我们有一个问题，想提请杨树浦区和普陀区的工人同志们考虑一下，为什么这两个最大的产业工人的地区的革命派不能够联合起来啊？究竟谁在那里挑拨你们？我们相信，这两个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有联合的愿望的。我们找过一些人谈话，没有人主张打内战，也没有人主张分裂，都想着联合，但是就是搞不好。一个区里边，搞了那样多的指挥部、联络站、分部，到处插手，你们又不去搞大联合，又不去搞“三结合”，那你们联络什么呀？指挥什么呀？这两个区的同志，还有其它地区的同志，我们相信群众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用不到我们出主意，你们有办法自己解决了！（热烈鼓掌）我们的工代会和红代会进展比较慢，这个不要紧，只要我们把大方向弄得更好起来的，而且可能开得更好一些！（热烈鼓掌）这是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和“三结合”。

### 三、抓革命，促生产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抓革命，促生产，我想不多说了，因为决议上面都写了。就想讲一点，就是现在缺勤

的比较多，劳动纪律不太好，因此弄得有些单位，劳动力相当紧张。工厂里边也有些逍遥派，一天逍遥自由，不好好劳动。我们觉得，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需要作艰苦的工作。这个不能完全靠纪律，因为纪律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才有效。也不能单单靠扣工资。那些都是应该的，不上班能够发工资吗？当然不能发！但是不能单靠这些办法，我们要靠政治工作。我们现在造反派的同志，很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做细致的政治工作不太会做，还没有学会这一套。在先锋电机厂，他们那天跟我们讲：他们造反派的同志去征求群众的意见，开门整风。有几个原来参加赤卫队的给他们提意见，开头就说：“你们还不如老当权派好呢”，这句话当然把我们的同志说呆了，“怎么我还没有老当权派好，你这话是反动话。”我们同志听不下去了。但是后来，他们说：“过去的支部，我有思想问题还来跟我做工作，找我谈话，个别谈心，帮助我。现在你们就不做这个事”。同志们，不要以为这些人过去参加过赤卫队，他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先锋电机厂的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我们那天也很支持他们，说：你们好，你们不但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听反对过你们的人的意见，而且不太好听的话都听了，在里面发现了正确的东西。这个态度，是革命造反派应该有的态度。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不大善于做这些事。所以这里抓革命促生产我就不想多讲了。想讲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夺权以后，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一种是成立“三结合”的班子了，我们造反派是当权派；一种是一个造反派或者几个造反派联合夺权还没有完全夺下来，没有成立“三结合”班子，但是权是掌握在他们手里。当然也有个别的、少数的，是保守派掌权，假夺权的也有。大多数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我们造反派掌权。可是我们有些同志，现在对自己这个地位的变化不大理解。我和有些同志谈话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他总觉得自已好象还是一月革命时期那个群众组织的人，忘记了自己现在是个当权派了。我们现在从原来不掌权，变成了掌权。我们过去都是被领导的工人、学生、普通的干部，现在变成领导人了。一个厂什么人领导呢？是造反派在领导嘛！同济大学什么人在领导呢？过去是王涛，现在是他们的一个学生陈敢峰做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二十几岁。现在就都是这么一些人掌权嘛！同志们一掌权，就不是那末舒服了，担子就重了。因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总是存在的，任何时候都存在。你一当上了领导人，就与被领导人有矛盾。只要你当领导人，就会出现这个矛盾。而我们有些同志，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了。自己的地位变了，要很好地、正确地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首先，要把自己这个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我们这个队伍，时间还很短，象红军游击队似的，还不是今天的人民解放军。就象刚拉起来的游击队差不多。思想水平当然比那个时候高了，斗争经验也不少，但基本上还处于建军初期的状态。所以我们做领导的要很好爱护自己这个队伍。爱护他，就要教育他，要耐心地帮助所有的战士。这一方面大概还比较注意。问题就是在听不同意见这一方面，现在有些同志还没有养成习惯，有的是硬着头皮听，还不是自然地要听，主动地找人家来提意见。对别的革命组织的态度，也还有问题，特别是还没有形成大联合的单位。不少单位有这个问题，一派一个组织、或者几个组织掌了权，但是另外几个也是革命造反组织，没有参加掌权。现在这个关系处理得都不好。这些掌权的同志，你要注意呀！你在那个地方有两重身份：一个身份你是革命造反派一个组织的领导人；还有一个身份，你是掌权的人。你就不能够说，这里一切归我，别的组织不能插手。请同志们对这一点特别注意一下。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明确地规定了，要正确处理别的组织的问题。江苏、安徽那个夺权，中央没有批准，就因为他们有这个问题，夺权派没有能够搞大联合。如果现在有些单位，在掌权的情况之下不和别的革命组织联合，那我们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办法批准。现在要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决不能够对别的组织采取压的办法，压是压不垮的。他只要是一个革命组织，你就压不垮他，压得只剩下三个人他也要干。如果你现在吃掉他，根据我们的观察，从来

过一个时候还要分裂。

没有那个革命组织被人家吃掉的。吃不掉，硬吃下去肚子要痛的，过一段时间还要分裂。那么，不要象原先那样子了。还是几个革命组织好好在一块，坐下来，根据毛主席的路线检查工作，多批评自己，少批评对方，多进行自我批评，少批评别人。这样，在思想上求得一致，大体上一致，能够搞联合，比较好。对保守组织的群众，更应该注意作细致的思想工作。毛主席最近给领导同志指示说，如果你那个地方有两个革命组织是严重对立的，只要我们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另外，对保守组织，也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毛主席还说，对有群众的反动组织，也要做思想工作。这个，同志们大概有一点听不进去，对那个有群众的反动组织还要做思想工作啊？有现成的例子嘛：“联动”，这是个反动组织，同志们都知道的，中央采取了什么方针呢？那还是采取从政治上对多数人进行教育，抓了一些人全部放了，完全放掉。放了以后，在阶级斗争中间，在群众运动中用来教育他们。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作应该越来越作得细了，因为事情越来越复杂，面对的问题非常多；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逐步地团结大多数。同志们要知道，一个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去做群众工作，不把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那么这个政权是不会巩固的。只有少数人支持，这是不行的。各个工厂、学校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要特别注意这一点，要逐步地把周围的群众团结起来。这个要靠作思想工作，不能靠压，更不能靠打、砸，砸是砸不出一个团结来的。要很好地掌权，我们就要学习，要经常的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要边战斗、边整风。工总司最近开始了自己的整风，开门整风，我们认为是很好。其他的革命组织，我们也希望他们都用这个办法来解决各个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这些东西拿到马路上去，贴大标语。那个办法只能使得保守派高兴，只能使得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大的劲，也没有搞到那么多的黑材料。但是我们的同志就不考虑这一点，就满街上去贴啊。这是从领导方面说要解决怎么样学习掌权、用权。

从革命群众方面来说，我觉得也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些同志，他们原来也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般的干部、学生嘛，他们也没有经验嘛，和我们原来一样的嘛。当然有些同志脱离群众，这个不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处境，应该帮助他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使得他们逐步提高。还是应该分清敌我嘛。王洪文总比陈丕显、曹荻秋好吧。这样的问题好象是个笑话，实际上应该考虑的啊。对待王洪文，总不能够象对待陈丕显、曹荻秋一样啊。徐景贤，我看总还是比陈丕显、曹荻秋好吧，应该作一些这样的比较嘛。就是象谢鹏飞，有时候他有一股闯劲，有时候也闯点祸，但比起来，我们就觉得象谢鹏飞这样的同志，比起铁路局原来的那些局长、党委书记要好多了。（掌声）我们都会有一个敌友我嘛，我们的战友有缺点错误，可以严格的批评。我们，我和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工作的几个月里面，对这一点还是遵守原则的。我们开小会，对革命委员会里面的工作同志，几个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批评起来，要比今天大会上批评的尖锐的多。我们出于爱护，希望他们好。对上海的所有老造反，我们都爱护，都希望你们一直造反到底，革命到底！（掌声）别人要攻你们，要打击你们，那毫无疑问，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支持你们！（掌声）但是，我们也希望同志们，要自觉地提高自己，珍爱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形势，把我们的革命大批判搞得更好，把革命的大联合搞得更好，把革命的“三结合”搞得更好。我们所有的革命同志应该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不可能在这方面使得敌人有什么空子可以钻。使得他们不能钻空子，使得我们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成毛主席所领导的最有战斗力的最强大的一支部队！（掌声）当然，如果发现革命组织里边，或者现在已经掌权的人里边，确实有坏人，那就

应该严格地划清界限，这个是不能含糊的。我们不是讲无原则的团结，我们是讲原则的。是敌人应该清除出去，是自己的同志就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自己的朋友也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子，我们才可能把现在这个局面搞得更好，使得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能够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我希望同志们，把一月十一号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的那一封贺电经常地拿出来看一看。拿出来看一看，同志们，不是要我们自我欣赏，你看我们上海多好呀，给了一份贺电！我是说拿出来咱们对照一下看，究竟这一份贺电，我们是做到了，还是没有做到？头一条吧，同志们，贺电一开头就说什么呢？“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怎么样呀，同志们？咱们是不是能够说是模范呀？里边还说了好多赞扬我们的话。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就说过，这份贺电是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鼓舞，同时，又是对我们的指示，就是要我们这样做。把这一段前面，加个“要”就差不多了，就是“你们要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那就差不多了。还有三月十八号《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革命干部的信》里面提出的，要做六个模范。这六条，也希望所有革命造反派派的同志也经常拿出来检查检查，我们究竟做到了多少？我们哪一些言论、哪一些行动是符合这六条的？哪一些是不符合的？符合的我们就坚持，不符合的我们我们就改。

我就讲到这里，其他重要问题请姚文元同志谈一谈。